

儒学在世界文化秩序变革中的贡献*

□ [美] 安乐哲 (Roger T. Ames) 撰

[美] 田凯文 (Kevin J. Turner) 译 徐钧鸿 校对

译者按：本文是安乐哲 (Roger T. Ames) 教授在“2020 年第十届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师资班暨十周年纪念会”闭幕式上的致辞。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师资班由国际著名中西比较哲学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 (International Confucian Association) 副会长、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顾问。安乐哲教授与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田辰山教授于 2011 年创办。十年来，师资班培养了来自芬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中国、意大利、俄国、波兰、马耳他、阿塞拜疆、土耳其、韩国、新加坡、德国、印度、埃及、丹麦、以色列等近 30 个国家 500 余名国内外跨文化学者，学员涵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夏威夷大学 (University of Hawai'i)、华盛顿大学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巴斯斯巴大学 (Bath Spa University) 等国内外上百所高校。2020 年第十届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师资班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承办，江苏省丹阳市中华传统文化学会、曲阜尼山圣源书院协办。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师资班是把中国故事讲清楚，建立中国话语，展示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平台。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中国为人类和世界做出重大贡献的一种中华新文明。师资班在中西比较视野下，阐释儒学是世界文化秩序变革的重要资源。

中图分类号：B2 **doi:** 10.19326/j.cnki.2095-9257.2021.01.003

如果我们不再忽视中国及其儒家的视角，那么具体来说，它对于正在变化中的世界文化秩序应做出怎样的贡献？早期中国文化的根源与当代中国文化之间的联系较古希腊与现代希腊、古罗马与现代意大利、古埃及与现代埃及之间的文化联系更具延续性。中国提供了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变革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几个世纪以来激烈的文化竞争点燃了汇聚与融合的熔炉。这一文化传统经历了几番西学东渐和佛教东传的浪潮，接着是耶稣会士所宣扬的教义到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再到今天的现象学和实用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传统经过吸收和内化，成为不断发展的儒家传统的一部分。而儒家传统的持久动力来源于它对于人类经验较为直接的叙述。儒家并不依

赖形而上学的假设或超自然的猜测，它关注的是通过美化日常事务从而提升个人价值于此时此地的可能性。

作为一种文化，儒家思想试图将人类经验中最平凡的事物激发为最非凡的事物。在生生不息的文明传承过程中，文化谱系隐含并依赖于参与者终日乾乾的修养和教化。个人的价值是人类文化的源泉，而人类文化反过来也为个人修养提供了环境。就宗教意识而言，儒家思想提供了另一种“以家庭为中心”而非“以上帝为中心”的宗教性，这不同于具有竞争性的亚伯拉罕传统。儒家传统并不做独特、排他和绝对之态。它并没有以某种“唯一真理”的名义在其信徒之中引发战争和屠杀。

* 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西方文化比较哲学研究”（项目编号：18ZDL29）的阶段性成果。

儒家思想非一神论宗教，却具有深刻的宗教性。它并不诉诸一个独立、可回溯的实体性的神性中介去作为表象背后的真理和所有宇宙意义的来源。事实上，儒家思想是一种没有上帝的宗教性传统，是一种宗教意识，它肯定了一种灵性，这种灵性来自于受启发的人类经验本身。对于儒家来说，世界是一个自然而然（“self-so-ing”）的自生自成的过程，而此过程中生生不息的力量蕴含在变化的叙事之中。它的世界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而人类情感本身是宗教性意义的动力，无论回顾还是展望，都被理解作为一种具有延展性和包容性的精神，在家庭、社群和自然世界的活动中得到了质的启发。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提高和完善人类经验的智慧，既激励着人类，也贡献了智慧。

儒家没有教会（除壮大的家庭外），没有祭坛（除餐桌外），也没有牧师（除了过去和现在被视为社会生活中心的模范人物外）。儒家颂扬人类发展和延续过程中的“道”，而此“道”是由整体意义塑造并促成的，一种所谓的“情境创造力”（Creatio in situ）概念，它与“无中生有”（Creatio ex nihilo）的神学传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儒家思想对我们理解社会秩序也有一定的贡献。儒家社会建立在“礼”上，即追求人的角色和关系的实现。从形式上来说，礼是被赋予意义的角色、关系和促成深厚沟通的社会结构，同时也促进家庭和社会的情感。所有形式行为构成礼的方方面面，包括餐桌礼仪、问候和告别、毕业典礼、婚礼、丧礼、谦让行为、祭祖等。从形式的意义来说，礼构成一个社会的语法，在人类经验的符号学中，它为每个成员在家庭、社会和政体中提供了一个确定的位置和地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礼不是外在形式而是内在韵律。礼的存在性让人类有活力并随时涌现。礼仪可恰当地描述为一种文化诠释学，因为它作为一个意义宝库，为一种生生不息的文明服务，并让人们恰当地坚持价值观，且总是使礼仪与新形势下的自身行为相适宜。我们在当下实践礼时，它的效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与过去的联系，故也连接着未来。

在话语化的家庭和社群中，社会秩序从关系性的“德”而来，这种“德”通过人与人之间有效的沟通交流得以体现。从最广泛的意义而言，

礼是一种公共语言。当然，礼是语言性的，但它不仅只是相互交谈，也是身体和手势的语言、音乐和食物的语言、礼仪和仪式的语言、机构及其功能的语言、角色和关系的语言。就儒学而言，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成就是在适应中取得了成功，而这种成功是通过应用由礼延续下来的社会智慧而实现的。

社会不是个人财产的产物，个人也不是社会力量的产物。有关联的生活和个人所需的协作并没有把个体在关系中结合在一起，而是将已形成的关联变得越来越富有成效。儒家思想提供了一种家庭和社群的观念，这种家庭和社群的观念基于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角色和关系对于恰当性的追求，使法治有所回应并强制实施。

礼是最基本、最持久的东西，孕育了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内在动力使法治有所回应并强制实施。不幸的是人们援引和实施法治有时是必要的，但有时退而求其次，法治在公共关系出现大问题时是有必要的，但它是第二选择，而且是对群体失败的明确承认。

儒家作为一种教育哲学，就其对于人类文化的贡献而言，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个人修养是儒家哲学的根本，而修身就是教育的实质。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任何根源如果没有正确定位且缺乏肥沃的环境，很快就会枯死。继续以园艺打比方，儒家教育可理解为一个过程，它从根本上嵌入并成长于构成我们作为人的角色和关系之中，这些角色和关系构成了我们家庭和社区丰富的背景。道德和儒家教育之间之所以有紧密关系，是因为二者都建立在我们角色和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标的工具性手段，而是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目标。我们追求教育，因此成长只是为了过一种智慧生活，我们通过在关系中生长而成为有道德之人，只是为了表现为有道德之人。由于“孝”是儒家传统的道德要求，显然，任何对这种传统教育哲学的理解都必须从构成我们作为家庭和社会角色和关系的首要地位开始。也就是说，在这个阐释框架内，有关联的人际生活被视为一个不争的经验事实。每一个人的生活和每一件事都存在于一个重要的自然、社会和文化背景中。我们的生活不在皮囊里，而是在世界中。并且没有人或物能够单独地、脱离关

系地做任何事情，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联系是事实，我们在家庭和社会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不过是特定的、有关联的生活模式的规定：母亲与孩子、老师与学生，甚至表亲与商店店主。

这些特定的角色并不是随意和偶然的，可以追溯到历史的迷雾中，追溯到人类最早形式出现之时，他们是人类家庭和公共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母亲和长辈的角色是人类宗谱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虽然我们认识到关联性生活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但是在家庭、社会和广义的文化叙事中，激发“仁义”是有规范的。我们所谓的“儒家角色伦理学”不过是一种规定性的关联，它记录了每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各种角色关系。儒家角色伦理是人类通过努力和想象，联想事实做出的判断。以儒家的角色伦理作为当时的道德生活视角，儒家提供了一种“双赢”或“双输”的选择，而不是自由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所持有的分裂和紧缩的赢家和输家模式。

当然，当我们转向儒家角色伦理学时，为“成仁”行为提供的具体指导标准，并不诉诸于自足的、抽象的原则，或抽象的价值或美德，而是侧重于理论的实践，付诸于我们具体的、更直接的家庭和社会角色的框架中。

与抽象原则相反，在我们生活的角色和关系中，我们可以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一种灵活的恰当性，如儿子对于母亲的义务。在此基础上，角色伦理学提供了一种直观的视角，能够具体地提示我们下一步应当如何做。

角色伦理学提供了一种在我们关系中最有效的行为方法的视角，提供了对于恰当行为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并没有遮蔽人类活动不可避免的复杂性，以服务于一种单一思想的是非观。“因为他是我的兄弟”这样的说法，是对个体行为一种简单而又甚为复杂的证据，而它在其他理由缺乏说服力时，恰恰能够说服人。

在儒家文化所感知的各个领域，从教育到伦理学，最重要的是由关系构成的人的概念。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也许儒家思想对于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它翔实、复杂、由启发道德思想的关系所构成的人的观念。这个观念可以用来批判和挑战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

具体来说，在这个变化的世界文化秩序的关键时刻，正是这种将人作为“过程性的人”的观念最为清晰地告诉我们应在交流的圆桌上给予儒学一席之地。这个说法并不是说我所主张的儒家文化价值能够解决世界所有的问题，也并不是说不可避免的西方化势力是有害的，须加以遏制。引起人们对儒家传统的关注，是希望在这个我们物种历史上人类生存状况发生最戏剧性变化的时候，我们能够为所有可供我们使用的文化资源腾出空间。

这里所提出的观点在很多方面是一种补偿性的，试着填补对来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古代传统的忽视所带来的无知。儒家文化传统具有很大的价值，可以作为丰富的世界文化的一个根源，也可作为一种对我们现存的价值批判。我们应当对它有更好的理解。

对于那些相信儒家哲学价值和制度能够给予新世界文化秩序有重大意义的人来说，我们需要回顾过去，继续思考儒学在其悠久历史中泛亚洲历史现象的贡献和失败之处，进而提出重要和批判性的问题。

我们也应展望未来，质问儒家价值的全球化是否有益于改善当今世界的局面。如果是的话，我们将如何挑战“全球化即西方化”等式对儒家文化意义的忽视——这是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而或许最重要的是，世界性的儒学如何改进并构筑起一种具有批判性的、不断前进的新兴力量来解决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紧迫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

(安乐哲：北京大学；田凯文：北京大学哲学系；徐钧鸿：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